

## 论郭沫若建国以后的诗歌创作

陈永志

### (一) 诗作的概况和基调

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在繁忙的国务活动和社会活动中，仍然没有停止自己的文学创作，他诗人的声音仍然十分嘹亮。

建国以后，郭沫若的诗集出版了《新华颂》（一九五三年）、《百花齐放》（一九五八年）、《长春集》（一九五九年）、《潮汐集》（一九五九年）（其中的《潮集》是属于这个时期的）、《东风集》（一九六三年）、《东风第一枝》（一九七八年），此外还有编入《沫若文集》第二卷的《集外（二）》。选集则有《骆驼集》（一九五九年）、《沫若诗词选》（一九七七年）。这期间的作品当然还有一些散见于报刊杂志上。这些集子，就其内容和形式看，大体上可作如下的划分：《新华颂》和《集外（二）》内容和形式都比较接近；《百花齐放》、《长春集》、《潮集》写作年代很相近，主要内容也类似；《东风集》就题材和形式说，都与其他诗集不同；《沫若诗词选》则包括一九六四年及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诗词；《东风第一枝》是郭沫若逝世后出版的，收入诗人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写下的作品。

《新华颂》是诗人建国以后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收入一九四九年九月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这期间的作品。<sup>①</sup>《集外（二）》则主要收集诗人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初的作品。这两部集子的作品，大多是自由体，反映了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取得的成就。

《百花齐放》写作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日至四月十日。《长春集》则主要收集一九五七年四月至一九五九年三月这两年间作品。《潮集》除去选自《长春集》的作品而外，主要收入一九五九年三月至同年九月间的作品。可以说，这三部集子主要歌颂了一九五八年与一九五九年间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所提出和实行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现在已经肯定，当时所提出的“三面红旗”，在指导思想和实践上，都存在着“左”的错误。因此，在郭沫若的颂歌里，不可避免地也把“左”的东西当成正确的来加以歌颂。在形式上，这三部诗集的旧体诗的数量明显增多，这是一个特点。

《东风集》除了少数写于一九五九年以及一九六三年初的以外，主要收集了诗人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二这三年间的作品。这时，我国正经历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国外帝、修、反大肆反华，我们党开始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消除左倾错误的不良后果。这期间，我国现实的阴暗面，诗人无疑是清楚的，但他却丝毫没有加以反映。诗人的足

迹遍及祖国各地，凡他耳闻目睹的，无论经济、政治、科学文教的新成绩，他都热情为之赞颂。此外，还有许多歌咏我国山河壮丽优美的诗篇。看来诗人是选取生活中的一个侧面，即在困难中仍然存在着的光明面来描写。诗人没有描写他所知道的困难和挫折，他相信党能战胜它们，他相信东风和春天，他用自己的诗歌来歌颂东风和春天。只要这歌颂不是浮夸，不是粉饰，那当然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东风与春天，仍然是我们生活中真实的存在，是我们战胜困难和挫折的希望和力量之所在！但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丝毫没有涉及当时生活的阴暗面，没有表现人们与之斗争的精神，读者是有充分的理由不满足的。就形式上说，《东风集》绝大部分是旧体诗词。从这个集子开始，郭沫若的诗歌创作转入以旧体诗词为主要形式了，而且词越填越好，越来越令人注目。

《东风第一枝》主要收集了诗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直到逝世前的作品。反映了诗人自己以及人民群众从“四人帮”法西斯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欢乐。郭沫若当时也恐怕还没有看到仍然存在着的矛盾和斗争。但把“四人帮”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这一历史性的胜利给人们带来激动和兴奋、欢乐和希望，也激起了郭沫若热烈的诗情。

从《东风集》到《东风第一枝》之间，空了好长的一段时间，这几年间的诗作，没有单独刊行过，而是收集在《沫若诗词选》里。就其形式说，继续了《东风集》的特点，绝大部分是旧体诗词。就其内容说，把《东风集》开始出现的反对修正主义的主题表达得更突出，更鲜明，篇幅也增多。此外，有不少作品歌颂初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了郭沫若诗词中具有显著政治错误的篇章。

总之，郭沫若建国三十年来的诗作反映了我国社会生活与国际交往的广泛领域。在新诗人中，就题材之宽广而论，郭沫若是首屈一指的。诗歌形式更加丰富多采，自由体、民歌体、旧诗（无论古体、近体，也无论四言、五言、七言、杂言）以及词、曲，他都得心应手地运用。郭沫若是我国掌握与运用诗体最多的诗人，至今还没有那一个新诗人可以与之匹敌。他在《赠北京中国画院》这首诗里写道：

胸藏万江凭吞吐，  
笔有千钧任歛张。

这两句诗用来说明郭沫若这期间诗作题材和形式的多样化也是十分适当的。

不管涉及什么题材，不管采用什么形式，郭沫若的诗篇都主要是歌颂的，可以说主要是唱赞歌的。这就构成了郭沫若建国以来诗作的基调。他建国以后的第一部诗集就以《新华颂》命名，而诗集的开宗明义第一篇就题为《新华颂》，这并不是偶然的。

人民中国，屹立亚东。  
光芒万道，辐射寰空。  
艰难缔造庆成功，  
五星红旗遍地红。

——《新华颂》

以宏亮的音调、灿烂的色彩，来歌唱，来描绘新中国。这种歌颂不仅仅是因为新中国现实成就的辉煌，而且包含着对理想明天的展望。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重新高扬，是郭沫若这时期的诗作的突出特点。以欢乐、昂扬的声音赞美祖国的今天和展望祖国的明天，这就是郭沫若建国三十年来诗作的基调。

上面已经提到，在郭沫若的赞歌中，有时会把错误的当成正确的来歌颂，把错误和正确

结合在一起。建国三十多年来，我们国家在各个方面的确取得辉煌成就，但由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所特有的复杂情况，由于我们党在领导工作上的失误，尤其是“左”的错误，使我们国家生活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更严重的，在一段时期内，并没有认识这个错误，反而把错误当成正确的来肯定。这些不能不给郭沫若以影响，也必然反映在他的诗作中。对于这些，我们既不必为贤者讳，也不能求全责备，苛求贤者。我们将尽可能符合实际的加以说明。人们不必担心这样的分析会损害郭沫若的形象，任何伟大的人物都不能没有时代的局限，只有给予切实的评价，才能使他的形象显示真正的光辉；人们不必担心这样的分析会影响对郭沫若诗歌的评价，他的诗作的价值是客观的存在，贬低它或拔高它都将受到它本身的否定。

## （二）三大主题

上面说到，郭沫若建国以来的诗作，主要是唱赞歌的，又说到，在郭沫若的赞歌里，时常是既赞美正确的，又赞美错误的。我们必须把两者谨慎地区别开来。关于那些错误的赞歌，下文将具体谈到，这里先分析那些积极的有意义的内容。这些内容，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歌颂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和领袖；

第二，歌颂人民群众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英雄精神，

第三，歌颂反帝、反修的胜利以及与各国人民的友谊。

这三个方面，也就是郭沫若这时期诗作的三大主题。

歌颂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庄严的主题，诗人是通过反映建国后多方面的社会生活来表达的。传诵一时的《长江大桥》、《向地球开战》，是反映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的；《断手再植》、《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是赞美我国科学技术赶上世界水平的。国家生活中的重大政治运动，诗人总是尽情讴歌，《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诗人的颂歌里，总是渗透着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热爱。诗人认为新中国的一切成就，都是党的领导。他把最火热的赞歌献给党。而在对党的歌颂中，总是结合着对于领袖的歌颂。在这方面，写得最好的是《骆驼》。这首诗也是郭沫若建国以来最优秀的作品，它葆有诗人善于从平凡的生活现象摄取形象，驰骋想象的特色。

骆驼，你沙漠的船，  
你，有生命的山！  
在黑暗中，  
你昂头天外，  
引导着旅行者，  
走向黎明的地平线。

并从黎明继续导引人们走向幸福的乐园，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全诗在优美的形象中，熔铸了深刻而丰富的内容，这就是歌颂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歌颂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以及继续向共产主义明天前进的气魄，而集中到一点，是歌颂取得这些胜利，获得这些成就的组织者和鼓舞者——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袖。“骆驼”就是党和领袖的诗意的象征。诗人把他建国十年的诗选，命名为《骆驼集》，既表明他认为建国以来的成就在于党的领导，又表现了对党和领袖的歌颂是他诗作最突出的主题。

在反映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诗篇中，不仅贯穿着对党和领袖的歌颂，还贯穿着

对人民群众英雄精神的歌颂。诗人歌颂向秀丽、安业民，歌颂黄继光、邱少云，歌颂雷锋、蔡永祥。一切为保卫新中国而献身的英雄，都激动诗人的胸怀。那些守卫在高山哨所、海岛前沿的战士，诗人也都献给他们真挚的歌。诗人更多的篇章，还是反映人民群众忘我劳动的干劲。我们似乎不必举出具体的例证，无论在诗人的哪一部诗集，都能够看到对干劲最热烈的歌颂。尤其是《百花齐放》、《长春集》、《潮集》，更把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间，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状态完全表现出来了。

也许人们会问：在“左”的错误的指导下，人们忘我的劳动应该歌颂吗？更进而言之，人民群众执行错误路线，不自觉为错误路线献身，应该歌颂吗？我以为对这样的问题简单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都是形而上学的。正确的答案来自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比如说，在民主革命时期，一些共产党员执行左倾路线，在党内对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当然不能歌颂，不仅不能歌颂，还应该批评。但另有一些共产党员因执行左倾路线，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英勇牺牲，这当然应该歌颂，但歌颂的是英勇牺牲的共产主义精神，而不是左倾路线。对于大跃进时人民的冲天干劲，也应该区别对待。对那时浮夸风、“共产风”，当然不应该歌颂，不仅不应该歌颂，还应该批评；对于人民为加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忘我劳动的英雄主义，则应该歌颂。当然，这种歌颂不能是歌颂“左”的错误。也许，这两者是不容易分开，但不是不能分开。这两者在一首诗里常常结合在一起，但在我们的理解上，在我们对作品进行分析时，却应该加以区分。

黄羊山上人满山，  
劳动歌声入云间。  
箩筐、扁担、铁锹铲，  
拦腰正把山劈断。

#### ——劈山大渠

这种振奋的精神，火热的劳动的场面，尽管包含着“左”的错误的影 响，但更多的却反映人民迅速改变落后面貌，迅速提高生产水平，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良好愿望。歌颂这种改造山河的英雄主义精神是无可非议的。

只有把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左”的错误区分开来，我们才能正确看待《百花齐放》、《长春集》、《潮集》中的许多作品，推而广之，正确看待当时出现的新民歌，以及其他存在着同样情况的作品。

除了国内题材外，诗人还有许多国际题材的诗作。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诗人尖锐地讽刺、猛烈地抨击、无情地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真挚地歌颂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友谊，而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倒行逆施，则给予痛斥：“自欺何蠢，欺人更劣。覆雨翻云谈贸易，乌烟瘴气闹分裂。”（《斥投降主义者》）。在这些诗里，充满着反帝、反修的必胜豪情。此外，他还反映了中朝两国“鲜血凝成”的深情厚谊（《歌颂中朝友谊》），反映了“骨连血肉山连水”的中越人民的友谊（《下龙湾》），反映了中国人民和缅甸人民、印度人民及埃及人民的友好往来。

由于诗人曾先后两次旅居日本共二十年。对日本人民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他不止一次地称日本为“第二故乡”。因此，在他歌颂各国人民友好的诗篇中，歌颂中日友谊占有突出的地位。一九五五年，他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期间，就写作了不少旧诗，除了编入《沫若文集》第二卷的《访日杂咏》外，还有他逝世后发表的《沫若佚诗二十首》。他热情歌颂中

日友谊：“重洋万顷波，友谊隔不断。长如日和月，照耀在两间”（《无题·一》）。从此以后，他从未间断过对中日友好的歌颂。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他还在《纪念抗日战争四十周年》一诗里对中日友谊的发展寄予无限希望。

诗人是我国杰出的国际主义战士，为发展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尤其是和日本人民的友谊作了许多工作。生活实践给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这个领域里，郭沫若诗作的数量之多，超过我国当代任何一位诗人。

上面，我们叙述了这时期郭沫若诗作的三个基本主题。这是他诗作的现实意义和积极作用之所在。这三大主题，表现出郭沫若诗歌的思想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丰富了。

### （三） 新民歌的影响 咏物诗和记游诗

郭沫若这期间的诗作，除了思想内容更加丰富而外，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特色，最为突出的是咏物诗和记游诗增多，以及非常显著的接受新民歌的影响。

正如上面所说的，这期间郭沫若的诗体更为多样。他不仅采用自由体，采用旧体诗词，更采用民歌体。在自由体方面，他仍然坚持从《女神》就开始了的基本经验，力求在每一首诗中保持形式上的某种统一。不少诗篇在诗行、诗节的组织、韵律的安排上都显得比较严整，《百花齐放》就很明显，一百零一首诗，每一首都八句，平分两节，韵式一致，每节顿数大致相同。由于诗人无意尝试诗的格律化，他曾说：“爱山还爱海？山海皆爱之。山体严格律，海是自由诗。”（《游里加湖·后十首之六》）因此《百花齐放》所体现出的格律并不表示他在诗歌形式上的发展趋向。他只是随着表达内容的需要，爱严整就严整，爱自由就自由。至于旧体诗词，他同样是得心应手，优秀的篇章不断出现。它们最突出的优点是语言通俗、明晓、口语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即是很好的例子。在一九五六年他就说过：“在今天作旧诗，要作得不象旧诗那样才算好。这就是说，要有创造性，要自然而流畅。”<sup>④</sup>我以为他的旧体诗词是达到了自己所提出的美学标准。

更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有意吸收了新民歌的长处，写作了一些民歌体的诗，这是他这一时期诗体新发展的重要表现。远在《女神》期间，就可以看到民歌对郭沫若诗作的影响。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郭沫若以后并没有有意识地继续在这个方面作进一步的尝试。一九五八年，我国出现了新民歌运动，这个运动对一些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影响。郭沫若从新民歌吸收营养，进行民歌的写作即是一例。

一九五八年诗人到张家口专区去参观，被新民歌所陶醉，他说：“劳动人民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泛滥成了诗歌的大洪水。文艺作家们要学习，要找课堂，不到这儿来还到什么地方去呢？”<sup>⑤</sup>他身体力行，向新民歌学习，他当时写的组诗《遍地皆诗写不赢》中，就有民歌味十足的诗：

劈开黄洋山，  
抬高桑干河。  
抛山下河岸，  
引水上山坡。  
翻山倒海寻常事，  
今日愚公天下多。

## ——《愚公天下多》

这首诗虽然诗行不整齐，但仍然是五七言式的范围。诗人还用这种格式写过一些富有民歌味道的诗篇或章节。不过，诗人向民歌学习，并不限于五七言的形式，何况一九五八年的新民歌已有不少突破了五七言的格式。

新民歌给诗人的影响，更多的还在于新鲜的情调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太阳问答》就是诗人从新民歌吸取灵感，学习新民歌奇特的想象和问答的手法而创作出来的。其形式又更灵活自由。类似《太阳问答》的艺术构思，以后又体现在《日月对话》里。诗人这期间还写了一些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诗，如《蝴蝶泉》《负石观音》等，富有浪漫主义特色，这和民歌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咏物诗的增多，也是诗人这期间诗作的突出现象。

写作咏物诗，诗人自少年时代就开始了，《咏牡丹》是很优美的一首。它继承了我国咏物诗词的优良传统，借物寄意，抒发了个人的情怀。以后，在《女神》、《星空》中，在抗战时期的作品中，都有一些优美的咏物诗。但由于数量不多，在创作中不占有显著的地位。建国以后，诗人的咏物诗数量激增，内容丰富，技巧更臻成熟，成为创作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其代表作是《百花齐放》。诗人在这部诗集里，或者从花的形态、色彩，或者从花的名称、性质，或者从花的培养以及用途入手，联想开去，或针对现实，或评论历史。《马蹄莲》、《鸡冠花》、《牵牛花》有明显的时代感；《晚香玉》、《美人蕉》议论古今文艺；《棠棣花》、《夜来香》具有科学精神；《菜子花》、《春兰》描写崇高的品格。内容虽不相同，但都是描写、议论、抒情兼而有之，知识性、政论性、抒情诗相互结合。这比之诗人以前的咏物诗词，显然有新的发展。

虽然就《百花齐放》整部诗集看，议论的特色比较鲜明，本色流于概念化。但其中也有具有优美形象的作品。《春兰》把安于平凡的高贵品格，优美、清雅的环境和谐地统一着，成为《百花齐放》最有余味的一首诗。《山茶花》则完全不同，描写了绚烂的环境，并以巧妙的联想勾勒出热烈、活泼的山地姑娘的性格。

跟咏物诗同样占有相当篇幅，成为这时期诗作中的一个突出的现象的是记游诗。

我们知道，郭沫若在少年时代就喜欢王维、孟浩然的诗，而王维、孟浩然的记游诗是很有成就的。郭沫若不能不受到他们的影响。比如说，王维就把禅宗佛理和山水形象融合起来，郭沫若在记游诗中也常于自然形象的描绘中，蕴含人生的哲理。但郭沫若的记游诗到底和他们不同，王维、孟浩然退隐林泉、寄情山水，探幽览胜，他们的记游诗就是山水诗。而郭沫若作为社会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因公务而足迹遍及四方，因而他的记游诗则不仅描写山水，也反映社会，显示了丰富的政治内容。《东风集》中的《广西纪游二十六首》和《咏福建二十二首》是两组记游诗，而其内容则不仅反映了广西、福建的自然山水之美，而且反映了这两个地方的建设发展、历史文物。描写建设发展虽有好作品，吟咏历史文物的精警之处也不少，但都嫌叙述和议论太多。《在广州游花市》反映社会风俗颇有诗意，但类似的佳作并不多见。应该承认，在丰富多样的记游诗中，最出色的还是那些记游山水诗。

歌咏自然，本是郭沫若所擅长，对《女神》的自然诗，一向是赞誉不衰的。即使是在这一时期，郭沫若独特的艺术才能也是在自然诗里发挥得最充分的。大自然的美景激起诗人的灵感，他常感到“云笈天上待诗篇”，“万木长毫提笔端”，常常是披襟伫立，妙句自来。里加湖的优美，金刚山的奇姿，尼罗河的月夜，日本海的晴朝，无不反映在他的笔下；桂林的山水；昆明的风光，西子湖的清流，北戴河的洪波，蜀道、黄山之奇，海南、鹭岛之美，无不呈现

在他的诗里。他的记游山水诗有气魄雄浑，洋洋洒洒的长篇，如《蜀道奇》、《黄山之歌》；也有形象生动，意味隽永的短篇，如《南水泉》、《东方县途中占》。但不论长篇或短篇，郭沫若那种色彩浓烈，境界开阔，想象超拔的特色，仍然很明显。那种直抒胸臆，热情直写的特色，也仍旧保持着：

八百里内形成一片峰之海，  
更有汪洋云海绕缭之，  
森罗万象难比拟，  
纵有比拟徒费辞。  
瞬息万变万万变，  
忽隐忽显，或浓或淡，  
胜似梦境之迷离。

——《黄山之歌》

的确，郭沫若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在记游山水诗中表现得最为鲜明。

#### （四） 主要缺点及新的觉醒

这期间，郭沫若的诗作，虽然在题材的开拓，形式的多样，内容的丰富等方面，比之以前有新的发展，但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

就自由体说，这期间仍然写了一些好作品，除了上面举到的《骆驼》，象《红场观体育节》、《五一节天安门之夜》、《渡与云》、《北戴河素描》、《题关良同志画鲁智深》，都可以列入他的优秀作品之中。尽管如此，这期间的自由诗加深了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就出现的缺陷，即概念化与散文化。也许郭沫若太熟悉诗歌这一文学体裁，他的一些政治表态，常采用诗的形式。它们当然不能算是诗，然而郭沫若却又把它们收到自己的诗集里。这就引起了读者的不满，也损害了他诗歌的声誉。象收在《长春集》里的《十日誓辞》，完全是一些政治口号的分行排列。当然，这样的作品不多，但空喊口号的缺点却是常见的。诗写得公式化、概念化，必然散文化。

这期间，郭沫若诗歌的更严重的问题是在内容上，在于他的诗歌赞颂了一些本来应该反对的事。最突出的是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期间的“共产风”和浮夸风。在上面我们说过，对于“大跃进”时期，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英雄精神的歌颂是正确的，而对于那时泛滥着的浮夸风、“共产风”、“左”的错误的歌颂是不对的。

早稻产量三万六，中稻产量四万三，  
红薯产量不是每亩即将超过一百万斤。  
钢铁产量也在见风长，谁说不是？  
再过几年就可以达到一万万吨！

——《体育战线插红旗》

这些不可能实现，不可能达到的，乃至违反常识的东西，是当时左倾错误的典型表现，郭沫若歌颂了它们，当然是不正确的。

这种错误，并不仅仅表现在他的有关“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的赞歌里，还表现在其他的地方。这是他建国三十年来诗作最基本、最主要的缺陷。造成这种缺陷，有着复杂

的原因。比如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在党与领袖关系问题上的严重偏差，我国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在解放后仍不易肃清，这就造成了我们党内个人崇拜滋长的一种条件。而郭沫若由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对党、对领袖的无比敬仰，在党内个人崇拜风气的影响下，他就很不容易区分什么是正当的尊敬，什么是个人崇拜，并且逐步陷入了个人崇拜之中。他在“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期间所写的那些错误的东西，我认为都与此有关。

我们不必为贤者讳，回避郭沫若诗作中的错误，也不必苛求贤者，以这些错误去贬低郭沫若。郭沫若一生的功绩、贡献是客观的存在，他的诗作的意义也是客观的存在。这些错误，在他建国后的诗作中，在他建国后的全部活动中，只是局部的，更不用说在他一生的活动中了。并且，我总觉得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郭沫若在他停止思索之前，是有所觉醒的，这表现在他的遗言里，更表现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写的《题关良同志画鲁智深》里：

神佛都是假，  
谁能相信它！  
打破山门后，  
提杖走天涯。  
见佛我就打，  
见神我就骂。  
骂倒十万八千神和佛，  
打成一片稀泥巴。  
看来禅杖用处大，  
可以促进现代化，  
开遍大寨花。

在这里，郭沫若又显示了他不朽的青春，蓬勃的生命和那破除迷信的勇敢精神。这首诗不仅是描写鲁智深的，而且是抒发个人情怀的。完全有理由认为，这首诗透露了郭沫若晚年思想的某种觉醒。遗憾的是，由于“四人帮”的迫害，诗人的健康已不允许他再继续歌唱，我们不可能看到他的思想继续冲破藩篱而翱翔蓝天了，不可能看到他汹涌的豪情似大海的波涛滚滚而来了。

这个遗憾是永恒的，让我们记住其中深刻的教训吧，让我们更认真地学习和继承郭沫若优秀的诗歌遗产吧！

注

- ① 《新华颂》，在编入《沫若文集》第二卷时，篇目有更动。我们据《沫若文集》计算。
- ② 编入《沫若诗词选》时，文字有改动。引文据《沫若文集》第二卷。
- ③ 见《文汇报》1979年6月13日。
- ④ 《谈诗歌问题》，《雄鸡集》第78页，北京出版社1959年版。
- ⑤ 《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雄鸡集》第11页。
- ⑥ 原注：诗末三行是指泥巴可以肥田利农。